

西安政治学院延安学研究文库
西安政治学院重点科研资助项目

延安时期政治工作研究

杨忠虎 主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政治学院延安学研究文库

西安政治学院重点科研资助项目

延安时期政治工作研究

主 编 杨忠虎

副主编 杨玉玲 李怀录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时期政治工作研究 / 杨忠虎主编.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24-09787-0

I. ①延… II. ①杨… III. ①政治工作—研究—中国
—1935~1948 IV. ①D6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215 号

延安时期政治工作研究

主 编 杨忠虎

副 主 编 杨玉玲 李怀录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30.7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9787-0

定 价 62.00 元

编委会

主任：齐三平 刘 强

副主任：乔 军

编委：徐自军 陈 耿 崔孝安 杨邦荣 杨玉玲

杨忠虎 王军旗 张理海 程达刚 王海平

杨东录 武军仓 李怀录 孟俭红

主 编：杨忠虎

副主编：杨玉玲 李怀录

出版说明

延安革命传统教学是西安政治学院的特色课程，2009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以课程建设为平台，学院形成了一支稳定的教学科研队伍。30余年的教学研究，不但探索了一套适合革命传统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而且奠定了延安学研究的良好基础。2006年，学院成立全军第一个延安学研究所以来，先后组织编写出版了延安革命传统教学系列教材和多辑《延安学论丛》。根据学院科研规划，今年正式启动了《延安学研究文库》系列丛书的编著工程。《延安时期政治工作研究》是《延安学研究文库》的第一部。本书以延安时期政治工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集成课题立项研究的方式，共设有24个专题，涉及延安时期思想理论教育、军队政治工作、党的建设、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各专题的作者均为学院各专业系有研究基础的专家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院延安时期政治工作研究的水平，是延安学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由于时间仓促，其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1年5月

总 序

西安政治学院院长 齐三平 政委 刘 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精神支柱，就没有灵魂；一项事业、一种追求没有精神支柱，就没有希望。放眼中外历史，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总会迸发出一些影响深远的精神力量，作为集体记忆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十三年的延安岁月，正如同哺育中华民族的黄土黄河一样，把厚重的历史和蓬勃的时代，深深融入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最深部，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灵魂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旗帜。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信仰之火点燃了中华民族博大的星空，领导人民不断走向胜利，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人以无私的牺牲奉献铭刻着一代开拓者的丰富智慧和宏伟业绩，凝结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延安精神。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这十三年的辉煌岁月，无论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她是我们党从失败中重新奋起并最终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基础的重要时期；她是我们党出理论、出政策、出作风、出人才、出经验的重要时期；她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军事斗争、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自身建设等领域取得重大理论和实践成就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讲道：“我说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中国革命以延安为出发点，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开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局面。辉煌岁月中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

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质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所包含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基本内涵，其内在品质必然彰显出她无限的生命力，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的不可动摇的精神归依。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延安时强调，延安精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丢”。

传统是联结历史与现实的基因链。延安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基因库”，她集中体现着我们党的核心价值追求，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和建设时期，都是凝聚全党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延安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追求。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共同体，这种活力深深植根于民族精神之中。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长河里，培育形成了特有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延安精神正是这种品质、这种传统、这种精神的升华和体现：作为一种奋斗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格；作为一种革命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作为一种奉献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朴素的民本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精神，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求真求实的优良作风。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延安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领下，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得到空前发展，政党的性质、宗旨、思想路线、优良作风等基本内核得到充分体现，进而使延安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乡，使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和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始终抱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念，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百折不挠地勇敢斗争。这种信念不仅使陕北高原上这块贫瘠的土地成为一座信仰之城、创造之城、活力之城，而且使延安精神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圣地，成为改革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延安精神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精神富矿。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正确的政治方向

的指引下，我们党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地位，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坚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坚持军民团结、官兵一致等一系列原则。日益成熟的建军治军思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延安精神作为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的最主要的、最宝贵的精神成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是一座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精神富矿”。

西安政治学院建院 30 多年来，不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干扰，学院始终坚持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的方向不动摇，先后组织 400 多批 16 万名部队学员和地方群众赴延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长期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以延安精神为母体的校园精神文化体系，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学员始终能够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获得营养，延安精神成为推动学院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2010 年 7 月，中宣部和总政治部把学院确定为全国全军重大典型，全国各大媒体在《时代先锋》栏目集中宣传了我们传播实践延安精神的先进事迹。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到，延安十三年历史及其创造的延安精神，始终是加强我党我军政治建设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座精神宝库；延安革命传统教育也需要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支撑；延安十三年应当而且能够作为一个专门学问进入学科研究视野。学院长期以来就把延安精神研究作为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2006 年，学院成立全军首家“延安学研究所”，利用地缘优势、教研优势和学科优势，在新的平台上推进研究工作。尽管“延安学”研究在内涵外延、学科定位、研究范式、研究层次等方面都有待继续拓展和深化，但它并不影响我们推动“延安学”这一特定对象的研究工作。多年来，我们先后出版了《延安岁月》、《民族之魂》、《圣地沉思》、《中共中央在延安》、《延安精神论纲》、《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理论与实践创新》等 20 部专著和《延安学论丛》系列论文集，配合教学编写新教材 7 部；教学成果先后获得军队级一等奖、国家级二等奖，《延安革命传统教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军队优质课程”。这些成果既有“延安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也有延安革命传统教育的教学研究成果，内容丰富、视角广阔、材料翔实、论理透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具有一定的

学术价值。

为了把“延安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按照“大科研观”理念，推出《延安学研究文库》系列，本着求实、求深、求新的精神，深入挖掘延安时期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成就，以专题形式充分展现延安十三年的丰富历史内涵。由于“延安学”研究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化学、战略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是一个需要以多学科知识背景为支撑的博大精深的学问，因而也是一个需要采取跨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开展研究的工作。《延安学研究文库》就是在跨学科联合攻关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展现“延安学”最新研究成果的一种载体。目前，我们取得的成绩与延安学宽广的研究范围和丰富的研究内容相比，尚显粗浅和单薄；我们所做的工作与我们的事业对延安热所反映出的需求相比，仍显不足。《延安学研究文库》只是推进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今后还将结合自身任务和优势，不断探索，把这项研究引向深入。

九十年风雨如磐，九十年岁月如歌。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时代不会忘记这片圣土、这座山城；过去虽已成为历史，但延安精神之树常青，价值永存。愿我们的《延安学研究文库》能为方兴未艾的“延安学”研究略尽绵薄之力！衷心祝愿全国全军的同人与我们一起在“延安学”的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〇一一年五月于西安

目 录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启示 1

延安时期党内民主建设 21

延安时期廉政建设 41

延安时期学习运动 63

延安时期新闻宣传工作 84

延安时期文艺工作 105

延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基本理论创新发展 124

延安时期军队党的作风建设 143

延安时期军队政治机关建设 163

延安时期军队干部工作 184

延安时期军队保卫工作 204

延安时期军队联络工作 223

延安时期部队战斗精神培育研究 243

延安时期典型战役中的政治工作 261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文化建设 280

延安时期民众政治动员 301

延安时期双拥运动 322

延安时期兵役动员工作 343

延安时期法制建设 363

延安时期妇女运动 382

延安时期领导干部战略思维培养 403

抗大教育思想研究 421

抗战时期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历程及影响..... 439

延安时期的国际交往活动 460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启示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利益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既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出了历史困境，不断壮大，为不久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当前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很多启示。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实践上都取得了广泛而巨大的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性，即对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之外，实际上还因为他们在实践中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从而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历史经验。具体来说，这些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全面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本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面对这一问题，不管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但是否能把这一问题解决好，并很好的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却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熟悉，

二是对本国国情及革命或建设实践的深刻把握，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我并不是说有此二者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但没有这二者，则成功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思想上的自觉，并取得对中国革命产生积极指导作用的理论成果，其主要原因也就在于这两者条件的缺乏。比如，在中共党内，很早就有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局限性，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与具体情况相结合。李大钊在1919年就指出：“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个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①但这并不能帮助他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更多的成就，原因就是上述两个条件李大钊都不完全具备。换句话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尚处在学习阶段，还不能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具体结论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中国广大的农村也知之甚少。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则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性，他们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和苏共革命的一些具体经验当成神圣的教条，而且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到了延安时期，情况则不同。无论是党自身的教训还是外在的环境都迫使中共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自身乃至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对于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来说都太低了。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②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再次指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

^①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②毛泽东：《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

现已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而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要求在全党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竞赛。并提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①同时，毛泽东本人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方面也为全党做出了表率。据统计，他在这一时期阅读的马列原著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多卷本和《理论与策略》（收入了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以及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②除此之外还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3版）》，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哲学选辑》等等，而且做了大量的具有创造性的读书笔记。毛泽东的很多著作都是在这些阅读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毛泽东等人的带动和督促下，不仅中共党内的高层干部纷纷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各类院校的几乎各种班次都设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课程，甚至在敌后的野战部队也利用战争间隙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保证这种学习的效果，从中央到基层，从地方到军队都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同时，为了满足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张闻天在马列学院亲自领导成立一个编译部，集中了一批人才，其中有张仲实、王思华、何锡麟等，专门从事十卷本《马恩选集》和十卷本《列宁选集》的编译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7、658页。

^②王炯华《毛泽东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工作。而且还规定每天译一千字，一年三十六万字。为了保证翻译工作，学院派了专门的服务员照顾工作人员的生活，每人每个月发四元五角津贴，仅次于政治局委员。^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也专门提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这些翻译工作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基本的教材。

正是在这种广泛而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中，毛泽东和广大党员干部摆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与中共领导人能够抓住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并着力解决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革命实践的成功。而革命实践的顺利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同时，“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②。因此，理论探索必须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因为如果理论探索和创新脱离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那将意味着它脱离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无疑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就会变得微不足道。同样的道理，这种理论探索和创新也将必然缺乏实践的支撑和强大的动力源泉。

在延安时期，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的确要比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更加繁多和复杂。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

^①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2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20页。

巨大的变化：革命任务从内战转为抗日，作战环境从根据地的反围剿变成敌后抗日游击战，自身地位由非法变为合法，国共关系从对抗转向既合作又对抗，党的对外交往也大大拓展了，以往的帝国主义变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局面，也使中共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制建设等各方面的的问题，同时党的队伍的扩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也依然存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干预仍然在党内产生作用。这些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既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面对上述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共领导人很快就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毛泽东为例，他在1935年11月的红一方面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就提出：“我们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大威胁。我们的发展对国民党的卖国政府是大威胁”，红军力量的发展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①。实际上已经明确了中日民族矛盾正在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指出了发展壮大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决定抗日战争以及中国革命能否最终彻底胜利的方面。1937年8月他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并揭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此后，几乎在整个延安时期，他都是紧紧围绕抗日战争和壮大革命力量这两个主题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方面，他从抗战开始就反复告诫前线的中共高级将领八路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专门阐述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游击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等，从而确定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军事战略。同时，还通过《论持久战》充分地论证了抗日战争将是一场以中国的胜利告终的持久战，从而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抗日力量，他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思想，改造党的作风，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撰写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基本来源，也是“人们对外界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369页。

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①，实践与认识之间循环往复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和发展真理。而任何实践都具有特殊性，认识这种特殊性才是解决实践问题的关键。换句话说，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只能从认识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性中获得。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结论并不必然正确。在1938年10月又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在11月撰写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从民族斗争和阶级基础的角度论证了在国共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1939年10月和12月，又分别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并特别指出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毛泽东又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在随后掀起了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整风运动，使党的作风、党的领导得到大大改善和加强。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总结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既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党的建设的期望。

不仅仅是毛泽东，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延安时期的重要著作也能说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展开的。比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任弼时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论统一战线》，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解放区战场》，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论待人接物》、《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这种集中力量、集中目标进行理论探索的做法，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